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 唐爱军

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91

一、中国道路的现代化主题

首先需要厘清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一是“发达社会主义”观。经典社会主义原理主要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经验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及其导致的一系列危机的判断上。“发达社会主义”直接的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其逻辑结构是这样的: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阶级的自由人联合体。围绕革命任务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诸如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工农联盟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国际主义理论等。二是“不发达社会主义”观。“发达社会主义”观中的社会主义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社会主义”观中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水平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所追求、建立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晚年关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在关于俄国的思考中,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成果:一个是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非线性进化的规律;一个是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思想,初步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过渡)与“现代化”(占有资本主义成就)两者勾连起来了。“不发达社会主义”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来发展生产力。列宁所提出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公式,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的思想渊源。“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在“不发达社会主义”观中,社会主义才能与现代化结合。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开辟出来,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思考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本质上就是“现代化”阶段,中国道路的实质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以“发达资本主义”为参照系,中国道路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通过工业化、

现代化,在经济和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历史过程,其带有明显的“赶超”特征;以“发达社会主义”为参照系,中国道路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现代化发展中建设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向理想的“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现实途径。“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而且需要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过渡时期,中国道路就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实践道路。

二、中国道路遵循的现代化规律

只有从生产方式逻辑及其变迁出发,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一,从横向逻辑看,生产方式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它决定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其他要素。第二,从纵向逻辑看,生产方式变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生产方式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标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只有从生产方式变迁逻辑出发才能正确地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也才能有效地阐释好中国道路。一是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看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变革。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变革之路,它要求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当中解放出来,立足于“现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状况,去调整生产关系;基于“发展的现实性”,建构起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可见,从生产方式变迁逻辑出发,尤其是回到生产力这一中轴,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道路就是超越借助“超前”“先进”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路,立足生产力发展水平,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二是从“现代化生产方式逻辑”看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划分“传统”与“现代”的根本

依据是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时代之所以是“现代化”的,在于其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它是马克思当年关注的主要议题。现代化生产方式的要素或特质表现为:第一,现代生产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生产,它采用机器生产,代替自然力和人力,并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现代社会是一种工业文明的新时代。第二,现代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决定了市场化的交换方式。商品经济的市场扩张机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世界市场不断打破人身依附关系、政治束缚、民族国家界限。第三,现代生产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当今世界就是现代化生产方式在全球不断扩张的时代,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构成了整个世界的潮流。中国道路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就是要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路向。改革开放构成中国道路的最鲜明标志。改革的本质是市场化,开放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两者都是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要求。从以生产方式为中轴的现代化逻辑看,中国道路有“破”有“立”: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破除基于理想社会主义所建立的生产关系;遵循以工业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化逻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融入经济全球化。

三、中国道路“新现代性”的独特性质

中国道路的历史主题是现代化,但其基本底色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步建构起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现代性”类型。

探讨中国道路的“理念—价值逻辑”,就是阐明其内在的价值原则和规范基础。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论依据,就是它导致了人的异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原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解放。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超越了把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当作发展目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

从“制度逻辑”考察中国道路,就是探讨中国道路的“制度性维度”。它指的是现代性在制度层面上的表现,探究的是实现现代性理念与价值的制度安排。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枢纽,资本逻辑决定了现代性逻辑。中国道路,归根到底是现代化之路,拒绝或抽象否定资本,只能走向“反现代性”;但又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防止资本导致的异化。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然是利用资本但同时又是规制资本的独特现代性类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导向、作用方式发生重大调整,更多地体现为在法治框架

内驾驭资本。驾驭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为资本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二是国家权力引导、规范资本,防止资本的异化。驾驭资本的国家权力是“发展之手”与“保护之手”的统一。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社会主义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比资本主义能更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它比资本主义更能够避免社会冲突和阶级分化,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但是,国家权力也可能蜕变为“掠夺之手”,所以中国道路必须解决国家权力的自我净化问题,即如何保证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可见,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要建构一套既能让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又能保证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制度体系,它构成了中国道路未来有效发展的制度支撑。

把握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就是探寻其在追求或实现独特现代性过程中所选择的具体路径和发展模式。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道路并没有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选择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二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自由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三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上,新现代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有两个重要原则:首先是“保护社会”。“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要求就是为资本“划界”,不能将资本逻辑和市场交换原则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领域,防止社会的殖民化。其次是“防止公民社会化”。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摆脱了“公民社会模式”,主张“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在实践中,建构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而言之,中国道路在塑造新现代性的实践过程中,摆脱了以资本扩张和“去国家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努力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发展中社会主义”观,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不走”来窥视其基本定向。一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中国道路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逻辑,必然要超越“苏式现代性”(苏联模式)。二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道路秉承了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指向一种新的现代性类型,必然要超越“西方现代性”。我们只有从唯物史观出发,才能破除各种话语陷阱,尤其是“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话语设置,进而才能正确地切入中国道路的“历史的本质性向度”。

■ 《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3期,约11000字